

# 中国现代学术

# 研究机构的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  
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 ■ 鹅湖学术丛书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缙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陈以爱 / 著

此书由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授权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陈以爱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8

(鹅湖学术丛书;5)

ISBN 7-5392-3847-X

I.中... II.陈... III.科学研究组织机构-研究-中国 IV.G3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714 号

##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陈以爱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mailto: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沿江北路40号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封面印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装: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4.25印张

300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5392-3847-X/Z·122 定价:32.0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 编辑人语

江右学术，推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缙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在学术图书出版叠床架屋之今日，要为自己操持的一套深度原创性学术专著取一个满意的丛书名称，着实费了我们几个愚钝的编书匠不少心思。某秋日，陪学界同道至铅山鹅湖书院寻踪朝圣，于习习秋风中目睹“斯文宗主”、“圣域贤关”诸多旧墨遗痕，不

禁感怀寄意，遥念起八百余年前极一时之盛的“鹅湖之会”，朱、陆辩难论诘之情形，依旧令人景行行止，温情与敬意填塞胸臆。蓦然间我们发觉：还有什么比用“鹅湖”来命名它更为合适的了？！

朱、陆所生活之宋代，乃中国文化之重要转折期与特出鼎盛期。陈寅恪先生曾推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江西，时人亦多有“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美誉。在此时空交结点上出现的鹅湖学术盛会，并非横空出世之偶然事件，而实崭露出一个思想活跃、诸说并起之学术繁兴时代，昭示着一处文化中心区域人文蔚郁、群星璀璨之阔大气象。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们从不以地域自囿，从不因地处边缘自惭，而一向努力追求胸怀中华文心学脉、放眼天下学术图景以尽当代出版人一己之学术文化担当；况且沾溉于如此悠远之地域文化资源，沐浴于千年不绝之流风遗韵，我们无法不油然对这份赐福深怀感激，并常萌生将其继往开来、光大发扬之念想。“鹅湖学术丛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与这种历史深处的人文底蕴时时在催促着我们戮力勤勉是分不开的。

要进一步说，我们坦言，以“鹅湖”为一学术丛书命名，还有深意存焉。在今天的各类辞典及史论著述里，“鹅湖之会”被简单地定义为朱熹之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之争。事实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与精神，远比历史的描述与记录丰富、深远得多。朱陆之异，首在为学工夫。朱熹指陆九渊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近于禅学，所谓“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而主张以“道问学”为重；而陆九渊则责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留情传注”、“增疣益赘”，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力辩以“尊德性”为先。这种学术分野，与当代学界近年的“思想”与“学术”之争，颇有异代同调、契合暗通之处，堪引以廓清今日之喧嚣与迷茫。鹅湖数日，朱陆双方细参异同，各抒己见，反复讲论，

但最终彼此存异,不合而罢。此后两家门人,各有所宗且互竞争雄,恰如两水分流,双峰并峙,在思想史上流衍、弘大为程朱与陆王二大学派。而双方于此颉颃互异之中,又不乏同情理解之心:朱熹晚年颇悔其支离训诂之失,而陆子不久亦有自责“粗心浮气”之语。所谓学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有克己之勇与服善之诚,此诚学人戒偏戒执之至道和现代学术精神之首端要义,与当代学人所谓“于己理论彻底而于人学术宽容”一说,不亦有精神相通之处乎?至于其他,如古代士子问道游艺四方的良好风习、于民间书院中接“学术地气”而使个体元气酣畅之追求、讨论天理心性之类形而上问题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想像、学术对手相互切磋砥砺的进学之道、“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学术胸襟等等,凡此“鹅湖之会”中所荷载之种种,皆为值得我们今天弘扬推重之优秀学术传统。由其光大的古代学术会讲制度,在近现代发展为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成为推动学术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与动力。但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在于,“鹅湖之会”所蕴含的学术精神,无疑有望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历史资源与一剂针石良药。质言之,“鹅湖之会”之所以被定格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会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士林佳话,并非因为其所具论百世不易,而乃因其藉争鸣以激荡思想、繁荣学术之优良传统为百世不可易者。逝者如斯——“鹅湖之会”早已超越了其具体论题,而逐渐凸显出其象征之意义:它所孕育的良好学术机制和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空气,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这一事关学术发展的“元问题”,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机制问题、学术“本土化”问题、“中国话语”问题等等,在时下复杂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一种发人警省、促人深思之历史一现

实关联性。所谓“赋新思于旧事”，“鹅湖学术丛书”接续于历史久远厚重的人文传统，而着眼于现实坚韧有力的学术建设，并深深期许于未来别开新局之文化前景。作为当代出版人，此等高远标杆，虽或有不能至者，但始终心向往之。

近十年以降，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学术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历80年代之激越蹈厉、90年代之沉潜蕴积并经跨世纪苍茫心绪之过滤淘洗，中国学术正借全社会创新之主旋律而深入精进。新世纪清明宽阔的学术舞台，正期待着当代学术中坚勇毅担当、践履自任。“鹅湖学术丛书”试图在此推波助澜，激荡风气，以促成新世纪中华学术之“预流”。在这个大的出版宗旨之下，我们并不想从学科内容上为丛书划定绝对明显的范围——如果一定要说有所限制，那我们想可以概括为偏重于人文而扩大至整个社会科学；而从特质上说则不妨特意提出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三原则”，以此有别于充斥坊间之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于重复堆垛而毫无新创之泡沫学术。

上承八百年前“鹅湖之会”学术民主之精神，适逢中国学术迈向繁荣新创之盛世，“鹅湖学术丛书”贯通历史当今，占尽天时地利，吾等编辑于此深感大幸，同时更觉有重责。志在学术之心意殷切，而常恨个人力气之绵薄，深恐有负士林学界之厚望，由此尤望天下学人同道乐于成人和之美，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共襄此旨在提升中国当代学术人文境界之善举，庶几可望构筑一当代学术之“公共空间”。

聊作以上赘语，以为启动“鹅湖学术丛书”之开场锣鼓。

国功 景琳

二〇〇一年五月

# 序

当初陈以爱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毕业论文由我指导,研究关于朱希祖与北大历史系的问题。以爱虽然初窥学术门径,对这方面的材料搜罗不少,也读了些相关的书籍。后来自港来台,归李广健。李广健也是我的学生,随我由香港到台湾,执教台南师范学院,继续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可独立治学且有成。以爱来台后,考入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重理旧业。他们夫妇从我游已十多年了。

以爱在研究所继续搜集有关北大的材料。我跟她说:你对这方面的材料已能确实掌握,并且可以灵活运用了。现在应该更上层楼,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加以注意。于是她以过去的基础,开始进行北大国学研究所的探索。不过,我跟她讨论北大国学研究所,不是没有原因的。

过去对一个学术问题或个人,或一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往往将其孤立于时代潮流之外,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讨论问题。因为任何学术问题与学术机构,以及学术人物个人,都是产生在一个时代之中,并且和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北大国学研究所是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所成立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与发展更具有时代的特色。

讨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运动驱使下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由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坚甲利兵,经甲午之战后的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最后到“五四”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动,从有形的器物学习,其间经历制度的改变,最终是无形的思想变化,前后不仅有脉络可寻,而且层次分明。这些不同的转变都是在不同阶段的民族运动激励下发生的。北大国学研究所的成立,虽然是建立起一个欧美式的研究机构,但最初的理想和目标是“整理国故”。“整理国故”就是整理自己的家业,然后在世界学术界争一个立足之地,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

民族运动的掀起,民族情绪的抒发,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但外来刺激如果没有遇上本土学术的波动,不过是一池春水中的涟漪,是无法掀起滔天巨浪的。事实上,作为中国学术主体的传统经学,依附政治长久发展以后,到晚清已遭遇困境而步入穷途,不仅开始松动,且已在结构解体中挣扎,完全失去其原有的绝对权威地位。于是原来在其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颖而出,争取平等的对待与地位。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以前的魏晋时期,以及“文革”风暴停歇后的中国大陆学术领域。当绝对的学术权威失势后,学术领域的讨论和研究有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北大国学研究所在这转变的趋势下成立,研究的范围已突破传统学术分类的四部局限,开始其多元化的发展。

任何的学术发展,需要有一个自由挥洒的空间。所谓自由挥洒的空间,是现实政治的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权威的时代,往往会出现一个文化与学术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个时代不在两汉与隋唐,而在紊乱的魏晋与文弱的两宋,其原因在此。而这两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样,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



形式,却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权力,虽然经济窘困,但却为学术留下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北大国学研究所应运而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以爱讨索问题的背景。不过其中仍有一些新的现象与问题值得讨论的。过去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国家在太学、国子监或翰林院;私学在书院。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国家的学术研究机构解体,私人讲学也式微。直到北大国学研究所成立,新的学术团体出现。而且这个新的学术团体,又独立于政治之外,成为全国性的新的学术研究中心,使得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精英分子,向这个中心辐辏。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现象。

北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其成员与主持者多出自章太炎门下,而且是浙江籍的留日学生。他们进入北大,代替过去桐城派的遗老,成为文史教学与研究的主流,并且掌握这个学术研究机构。这批浙江籍的留日学生最初掌握北大国学研究所,也有地缘的原因。明清以来江浙的经济繁荣,是人文荟萃之地。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造成东南沿海农村经济的破坏。尤其新的都会出现后,使城乡差距加大。科举制度被废除后,这批出身社会基层的精英,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于是东渡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并且将传至日本的西方思想转介到中国来。因此,在“五四”以前,日本成为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的驿站。这批留日的社会精英,也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物。所以,在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他们的贡献与影响,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变与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影响直接代替了过去日本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时期,那么,20世纪的五四时期,则是西方向中国推销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个时期各种西方流行的思想,纷纷在中国杂陈。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其他的思想再不必经过日本的转口,都是从原产地直接输

人,在中国行销。就在这个时代,胡适从美国回国,并且得到杜威思想在中国行销的代理权。

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涛里现身,来得正是时候。而且他出身徽商家庭,是一个天才的行销者。他选择代理的,不是艰涩空疏的理论或主义,而是一种治学的方法与态度。这种治学的方法与态度,一如胡适本人平易近人,使人容易接受。因此,他的一句“只有经过实证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彻底摧毁了正岌岌可危的传统经学。因为这种绝对的学术权威,过去是不可怀疑更不可议论的。

胡适并且将他行销的实证方法,巧妙地与乾嘉的治学方法相衔接,以“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第三阶段的行动口号,并且以《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昭告世人。无疑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引导中国学术由传统迈向现代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洒满北大国学研究所同人的汗水,并隐现着章太炎的影子,只是借胡适道出,使他取得引导学术的发言权,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自此以后,胡适借推行“整理国故”而发生影响,终于以欧美的影响,完全取代过去来自日本的影响。而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北大国学研究所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

以爱读书甚勤,曾先后两度到北大图书馆及档案室搜集相关的材料,并且将这些材料梳理成章,连缀成篇。她一步步踏踏实实走来,已渐渐寻觅到自己该走的路了。不过,这只是开始,以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逯耀东

岁末序于台北糊涂斋

# 自序

这本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的书，是以我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的。虽然在我初入史学门径时，就选定现代学术文化史为研究范围，但这本书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却是经过了好几回的转折。

四年前我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想以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成立及其早期历史为研究重心，借以探讨史学在现代学院中的发展动向。两年前向所里申报论文题目，也是以此为范围。当时之所以选定北大史学系为研究对象，是因先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念书时，曾于逯耀东师指导下，以此为题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毕业论文。写完之后，觉得这个课题涉及的问题颇为广泛，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此进政大后又报了这个题目，仍请从香港回台大任教的逯师指导。

到了该动笔的时候，我思前想后，决定赴北大一趟，为的是把资料搜集得齐全些。没想到这次北京之行，固然使我补充了一些史学系的资料；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室和档案室里，我更意外地接触到大量研究所国学门的文献，包括其章程、会议记录、期刊等等。虽然以前在阅读《北大日刊》和《国学季刊》时，我已知道北大在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2

1922年曾经成立过一个研究所来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但我并未注意到这个机构在成立后的数年间，竟已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工作，显然是20世纪20年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回台湾后，我把上述发现向逯师报告，在他同意下，将研究重心从史学系转移到国学门，希望透过考察这个机构的创建与发展，能对“整理国故”运动之早期阶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样转变题目，并要在不到一年内将论文完成，自然不是轻松的事。好在撰写范围仍以北大为中心，遂凭借先前累积的基础，再将新搜集到的材料加以整理，撰成硕士论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因为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极为匆忙，所以我对它颇不惬意，口试过后即欲进行修改。论文中我以为最宜加强的地方，就是关于学术研究机构的创立原委这一部分。其实当初写论文时，已经意识到现代学术机构之建立对学术成长是一巨大助力，文中对此也有所论述；但由于当时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消化及排比资料上，以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颇欠深入。感谢政大历史所的老师，认为这篇硕士论文还有可取之处，将其列入政大“史学丛书”出版，给予我从事修改的机会。于是，在攻读博士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对论文作全面修订。

在这个业经修订的版本中，更动最多的部分，就是在第二章增设一节，专门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出现的学术文化背景。题目方面，也遵照逯耀东师的指示及汪荣祖师的意见，把主、副标题作了调整。顺应着题目更动后所标示论文重点的转移，我尝试把国学门的创办，更多放在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试图通过阐述国学在这个机构中发展的动向，来说明现代学术体制出现后，学术发展的面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在修改论文期间，我越来越觉得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是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课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复杂,它与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动,都有密切关联。这都不是本书所能兼顾到的,有待日后进一步的考察。因此,对于本书的出版,我一面将其视为是个人习史的记录,同时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新的起点,希望今后能在现代学术文化史这个园地中,脚踏实地地往前迈进。

在这个学步的过程中,对许多引我上路的老师及从旁扶持的朋友,我都满怀感激。而在众多师长中,逯耀东师对我的影响,可说最为深刻。由于在大学时代上了逯师所开的各门课程,我才对学术文化史产生浓厚兴趣,并在老师指引下初窥治学门径。大学毕业后,我本已进入中学教书,是老师到香港鼓励我来台湾考研究所,才使我重新走上这条道路。十年来,从新亚书院相思树旁老师的研究室到台北“糊涂斋”,我常是一面接受老师的熏陶,一面向他报告最近的研究心得;而他就在满室缭绕的烟雾中,就我的报告提出一些问题,又或是提醒我往下该留意哪些关键处。这些指点往往只是几句话,然而我对现代学术史的探索,就是从这几句话起步的。今年适逢逯师退休,我曾随诸学长之后,将纪念论文集《结网编》献给老师,兼为贺寿之礼;现在愿意再把这本书敬呈与老师,以表达我对他十年来无微不至教诲的感谢。

对政大的师长,我也愿借此机会表达心中的谢意。在老师们经营下,政大历史所拥有一种温馨融洽的气氛,使我得到一个安心读书的环境,这是应当对全体老师表示敬意的。对林能士师,我尤其抱深深的感谢。因为从进政大起,林师不但在治学方面一直予我鼓励,在生活上也常关心我的适应问题,往往每过一段日子就垂询我的近况。我来台后能迅速适应并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不能不感谢林师。

就治学方面说,我深感庆幸的是,这几年来,政大在史学史方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史门为中心的探讨

4

面，一直有名师坐镇。像在杜维运师及汪荣祖师的“史学史”课上，我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汪荣祖师且在担任客座的一年里，把我的论文阅读一过并提出宝贵意见。而去年论文口试时，阎沁恒师及台大查时杰先生担任口试委员，都曾给我一些重要的建议，在此也要对他们表示谢意。

同时，我还要对吕芳上师表达诚挚的谢忱。吕师在现代史方面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学生所不吝给予的鼓励，既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又使我在更为确定自己的路向之余，增添许多往前探索的信心和勇气。再者，老师屡次提醒我该和同道多加切磋，又使我因此获得许多检视及修正自己观点的机会，在这里谨向老师献上我衷心的感谢。

在上述师长以外，从资料的搜集到本书的写成，还有许多前辈先生对我提供过帮助，他们包括：傅振伦先生、韦庆远先生、田余庆先生、林被甸先生、王世儒先生。其中，年逾九十的傅振伦先生不但把他珍藏七十年的国学门文献让我影印，又两度跟我谈到 20 至 30 年代学林掌故之种种；这些第一手资料和回忆，皆为本书写作的重要参考。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致深切的谢意。

除此之外，北大陈洪捷先生，政大刘龙心学姊、李美慧、林秋志及王永慧同学，在观点上都曾予我启发或建议；潘韶颖、谢振贤、袁明蕙，分别替我在日本、香港影印资料；陈识仁不厌其烦地帮我解决电脑上的问题；李素琼助教和张志铭同学，为本书的出版费神费力，在此一并志谢。

这里不应遗漏了外子李广健。十一年前我们相识于中文大学校园内，由最初的助教学生，后来转为同门，三年前更结为夫妻。这几年来，作为我的经济支柱，广健使我无柴米之忧，得以充分享受读书之乐。当我在研究时有什么一得之见，他作为第一个分享者，常运用我们从前上导修课(tutorial)的故技，对我的观点进行质疑辩难，所以这本书实已融入不少他的意见，此处自应对这位学侣

表示感谢。

最后我想说的是,正如本书内容所展示的:现代学术之进步,是以频繁而开放的学术交流及学术讨论为基础,因此本书虽是一个历史学徒的学步之作,但我仍期盼前辈学者能不吝提出批评和指正的意见。

陈以爱志于台南有涯斋

一九九八年十月

# 前 言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学术思想的自由、学术流派的众多、学术刊物的纷杂,均为此时期显著之特色。而当 20 至 30 年代期间,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向:其一是欧美式的学术机构在各地纷纷成立,最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综合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和北平研究院;另外则是整理国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后出现(“古史辨”亦其中之一环),并迅速扩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学术文化运动。这两种趋向在学术界之兴起与汇合,追根究底,皆可溯源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下简称北大国学门)之创办。

本书对北大国学门早期历史(1922—1927)的探讨,主要是着眼于以下两项重要事实:第一,国学门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sup>①</sup>其次,国学门同时也是“整理国故”口号提出后,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范围而成立的学术团体。

欧美式专门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兴起,虽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特色与发展动向,反映出当中国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组织正进行转化与重组之际,学术研究也出现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的



趋向。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学者注意及此的不多,研究成果尚少。<sup>②</sup>然而,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蔡元培,于20世纪30年代初总结甲午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大势时,却是郑而重之地指出:

综观所述新文化的萌芽,在这三十五年中,业已次第发生;而尤以科学研究机关的确立为要点。<sup>③</sup>

蔡元培所说的“科学研究机关”,其“科学”二字采广义的概念,所以文中也提到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之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综述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大势的文章中,蔡元培特别提出研究机构之设立,是这段时期中国学术文化领域中最重要之发展动向,是则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之兴起与普遍设立,确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者所不宜忽略。

本书之撰写,虽未能就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出现之原委、特质及影响作全面探讨,却愿以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早期发展为重心,就下列问题展开初步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具有哪些特质?当学术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后,其发展面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简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国学门发展历程所作的论述,能让我们了解到外在学术环境之变迁,对学者及其学术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为何。

对于外在环境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学术机构对学者研究成绩的影响这一问题,默顿(Robert K. Merton)早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结合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名著中,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指出科学家彼此间的会面、通信以及期刊的出版,提供了思想交流的机会,因而有助于创造性研究的出现。像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这类学术团体的成立,因强化了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导致科学研究的兴趣与成就在当时的英国有显著增长。<sup>④</sup>至于